

第一章 秦汉王朝岭南地域结构中的合浦

岭南首先是自然地理概念，指横亘两广北部与湖南、江西交界的南岭山脉以南地区，即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南，又有岭外、岭表、岭峤、岭海等名称。岭南又是一个历史地理范畴，“‘岭南’一词较早见于《史记》，据称‘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后汉书》称赞九真太守任延和交趾太守锡光教当地各族人民礼义，说‘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1]，唐代正式在广州设置岭南道、岭南节度使。

“五岭已前至于南海，负海之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2]，历史上的岭南地区一般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中部。秦汉王朝“岭南地域”的设定应遵循自然地理属性与历史过程属性相结合的原则，以期达到研究区域的完整性“在历史与地理两方面的统一”^[3]。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结合秦汉时期的行政设置及考古材料考察，秦汉王朝岭南地域范围大致北达南岭，东抵韩江流域，西括左江、右江流域和南盘江、北盘江流域，南至海南岛和越南中部。

一、地理空间结构

岭南地区河网密布，海岸线曲折漫长，山地、丘陵和台地约占陆地总面积的80%，区域内缺乏面积较大的平原、盆地。山地多由花岗岩、红砂岩构成，易风化成丹霞地貌；广西及越南北部石灰岩分布广泛，多形成岩溶地貌。平原主要分布在江河沿岸、山间盆地及河口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是发育在海湾内的丘陵型三角洲平原，面积约1.1万平方千米。红河三角洲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两者均是著名的农耕区。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亦是重要农业区，其中郁江沿岸平原为岭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山地（包括丘陵、台地）与平原（包括三角洲、盆地）构成了岭南自然地理的第一组区域对应关系，沿海地带（包括雷州半岛、近海岛屿和海南岛）则与内陆腹地构成了岭南自然地理的第二组区域对应关系。

由两江、北江和东江三大支流汇集而成的珠江是岭南最大水系，流域面积达42万多平方千米。西江水系在梧州以上河段呈叶脉状分布，红水河、柳江汇流成黔江，左江、右江汇流成邕江，其下河段称郁江；黔江与郁江合流为浔江，与桂江、贺江、北流江等共同组成西江水系。珠江水系以外，红河是越南北部第一大河，在云南境内称为元江，全长约1200千米，流域面积约3.81万平方千米；越南北部的马江、嘎江（大江）和粤东地区的榕江、梅江—韩江也是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在广西和粤西沿海地区，还有钦江、南流江、鉴江、漠阳江等独流入海的水系。在桂东北地区，灌江、海洋河组成湘江上源，汇入长江水系。依托水系分布，岭南地区主要江河在其流域范围

内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大多可以与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单元相对应，范围已经超出了岭南地域。

岭南人文地理区域的形成与生态环境背景有关。在中国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版图构造中，岭南地区有许多方面表现为独立单元结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岭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路径，决定了岭南地区内部存在的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影响着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和岭南文明的特质。据《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推测，南越国“除了都城、郡县所在地，江河沿岸平原地区以外，当时的岭南东部、东北部、西部、西北部等山区，恐怕还是一片篁竹草莽之地。……这些地区的土著越人，可能还停留在初民社会阶段”^[4]。在宏观历史进程中，岭南地区成为中国文化圈与东南亚文化圈联结的过渡地带。

在岭南地理空间结构中考察秦汉时期的合浦，主要有两个观察维度。其一，合浦位于北部湾北岸，背倚山地（云开大山、六万大山）、襟带江河（南流江）、面向海洋（廉州湾），居于山、川、海之结点位置，有学者认为合浦“即河海相交之意”^[5]；其二，宏观而言，合浦处在珠江水系与红河水系的中间位置，东汉马援征伐“二征”是从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6]而入交趾。这两个地理维度决定了合浦在秦汉时代岭南地区族群分布、行政设置和海上交通上的特殊属性。

南流江是桂东南地区独流入海的较大江河，发源于大容山南麓，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北流市、玉林市玉州区、博白县、浦北县，在合浦县注入廉州湾，全长 287 千米，流域面积 9439 平方千米，流域范围为大容山、云开大山和六万大山所环绕。南流江在合浦境内分为南干江、西门江等水道入海，构成了南流江冲积平原的主体部分，合浦汉墓和汉代城址都分布在此冲积平原上。自合浦溯南流江而上，逾桂门关分水坳，可沿北流江抵达西江中游^[7]，继而可以通过湘桂走廊、潇贺古道抵达湘江，这是古代从中原进出北部湾的最便捷通道。

合浦濒临北部湾，作为西汉中期合浦县治所的大浪古城距现今出海口约 20 千米，作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合浦郡治所的草鞋村汉城址距现今出海口约 10 千米，大约在 2000 年前，这个距离更近，分别约为 16 千米和 3 千米。当时的海岸线可抵达现今的廉州镇一线，两座城址均位于距离当时海岸线较近的河汉内，与广州、宁波、泉州、扬州等其他古代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吻合^[8]。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9]，襟带江河、面向海洋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秦汉时期的合浦在岭南地区内河交通、海外贸易、海洋生计等方面的特性和地位。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10]，“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11]，包括合浦汉墓多见海外文化因素，均是当地居民采取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的表现。宋代合浦盐产品仍然在“石

康落船，然后循南流江和武利江运至郁林、武利（今灵山县属），起岸后再由陆路”转运集散^[12]。至于合浦背倚山地的地理意义，则主要表现在族群空间结构方面

二、族群空间结构

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空间结构处在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以秦定岭南、南越国灭亡和两汉交替作为主要时间节点，南越国时期和西汉郡县时期是其中的两个关键阶段。南越国时期由于受中原等地区南下人群的冲击，一则岭南土著越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融合，在文化性质上逐渐向次生越人转变；二则岭南土著越人的生存空间也受到很大挤压，被迫向岭南偏远地区退却。至西汉郡县时期，岭南地区的次生越人进一步与已经逐渐“在地化”的汉人移民融合，共同发展为土生汉人，不过在岭南偏远的山林地区仍然有大量土著越人分布。

《史记·货殖列传》称“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战国至西汉时期岭南地区活跃着西瓯、骆越等百越支系。一般认为西瓯先民主要分布在今桂东北地区 and 西江中游，考古遗存以平乐银山岭、广宁铜鼓岗等墓地为代表^[13]；骆越先民分布在“今邕江及左、右江流域至海滨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考古遗存以右江流域的武鸣元龙坡、安等秧等墓地为代表^[14]；海南岛上的“骆越之人”或许只是泛称^[15]，类似于“儋耳夷”^[16]这类称呼。还有学者认为桂东北、粤中、粤北的土著越人分布在苍梧^[17]，将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广东方向越人直接称为南越^[18]。此外，桂西地区的西林等地属于濮人建立的句町国地域范围^[19]，有学者认为南方民族史中的濮就是越^[20]，或者指濮、越混杂的居民^[21]。

南越作为政权名称，兼及地理方位，可以引申为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分布的越人集团名称，这支越人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与传统认识不尽一致^[22]，有学者推测西瓯先民主要分布在郁江流域向南延伸至合浦方向的桂东南地区，秦定岭南后逐渐退居山区，东汉以来与其他百越支系共同发展为俚、蛮、乌浒之属；战国西汉时期的苍梧遗存分布在楚、秦苍梧郡及其周边地区，即湘南、桂东北和粤北的交界区域；战国时期的骆越应该单称为“骆”，属于西南夷中的百濮人群。战国秦汉时代百越与百濮大致在左江右江流域、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形成文化交汇地带，随着岭南越人影响的增强，骆人持续越化，东汉时期主要在越南北部地区形成了骆越集团^[23]。

在南越国的主要统治区域，土著越人与自岭北不断南下的楚人、秦人、汉人发生融合，文化属性逐渐转变为次生越人；至汉平南越以后的西汉中后期，次生越人与不同批次南下的、已经陆续“在地化”的中原等地移民继续融合，逐渐发展为土生汉人^[24]

（参见第七章第一节）。东汉时期汉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覆盖岭南大部分地区，但是合浦郡和交趾三郡族群分布的基础格局未见颠覆性改变，汉人主要分布在郡县治所和交

通要道沿线。东汉时期合浦周边和交趾地区新出现了俚、蛮、乌浒等越人集团，有学者认为俚人主体成分可能是骆越^[25]。

将文献中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比较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这曾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26]，不过所得结论经常不一致。原因在于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复杂性，“除了古籍所记族人是否等同一考古学文化外，还存在文献记载、疏、注及考证和对考古学遗存的认知问题”^[27]，前述关于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土著越人的认识自然还可以讨论。

战国秦汉时期合浦在岭南族群分布的空间结构中颇有值得注意之处。

其一，合浦双坟墩发掘有两处土墩墓^[28]，其中 D2 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D1 年代为西汉中期。先前有学者指出江浙地区的吴越居民自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已经开始向岭南迁移，但是线索主要集中在广东方向^[29]，双坟墩的发掘表明北部湾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路联系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已存在^[30]。

其二，根据唐代贵州郁平县（今广西玉林）“古西瓯、骆越所居”，潘州茂名县（今广东茂名）“古西瓯、骆越地”等记载^[31]，学术界多认为处在汉代合浦郡范围的桂东南和粤西南近海地区为西瓯、骆越杂居之地，不过这可能存在误解。有学者认为“西汉以后各地志书所载的‘西瓯所居’‘骆越居地’‘西瓯骆越所居’，都不完全是他们在先秦时期的居地，只能是秦以后甚至汉武帝以后所散居的地方”^[32]。有学者推测西汉武帝设置郡县后有部分西瓯人很可能退居云开大山^[33]，南越国和西汉郡县时期仍然有许多越人活动在合浦周边地区，包括劳邑、朱庐等部族^[34]。

其三，东汉出现了“合浦蛮里”^[35]“合浦蛮夷”^[36]“合浦、交趾乌浒蛮”^[37]等名称，这些人群大多为西瓯、骆越后裔。俚、蛮、乌浒并见于交趾地区，文献中有“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38]“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以南、交州以北”^[39]等记载，表明东汉时期合浦地区与越南北部、中部的族群结构具有较多共性。

“汉武帝成立南方九郡，把西瓯骆越集居的地方取名为‘合浦郡’，或者正由于此地是濮人集居区”^[40]，合浦南越国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说明当时居民以本地越人为主（参见第六章第一节），汉文化的影响远不及南越国都城番禺强烈，次生越人的发育亦不及番禺地区明显。西汉中期以后，合浦汉墓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和大浪城址、草鞋村汉城址的修建都说明郡县治所及其附近主要居住着汉人，但是周边山林地区仍然基本保持着土著文化的状态。

三、行政空间结构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地域范围与秦岭南三郡（南海、桂林、象郡）基本相当，又在海南岛续置珠崖、儋耳两郡，隶属交趾刺史部。西汉岭南七郡地域及属于西汉象郡管辖的广西西部是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基础行政范围。在此基础行政范围内外，以西汉时期为中心的行政设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若干行政设置有废并。

在海南岛方向，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5年）置珠崖、儋耳两郡，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并儋耳郡入珠崖郡，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珠崖郡。在桂西方向，有些学者认为西汉曾经存在归属于益州刺史部统辖的象郡^[41]，在昭帝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42]。

其二，若干行政设置跨入岭南。

武帝灭南越国后，在桂东北方向分长沙国桂阳郡一部和南越国一部置零陵郡，郡治零陵故城即今全州城子山城址^[43]。战国中期以后这一地区已经属于楚国南境^[44]，西汉初年属吴氏长沙国，是楚汉文化进入岭南的桥头堡，与岭北地区关系更为密切^[45]。在粤北方向将含洫、浚阳、曲江三县（英德、曲江一带）归属于岭北桂阳郡^[46]，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州，零陵郡和桂阳郡属于荆州刺史部。在桂西方向，扩大后的牂牁郡并入了句町国，包括左江、右江流域一部^[47]，属于益州刺史部。

其三，若干行政设置为虚封、羁縻等特制。

秦代在岭南地区推行不同于内地的郡县制度，“南海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48]。南越国实行两种不同的郡县制，“一种则是特制，设‘道’或类似的行政单位，由南越派遣官员和该地越人部落首领联合治理”^[49]，如在桂东南玉林一带设置劳邑等管理土著越人部族的羁縻机构^[50]，发掘报告亦推测五华狮雄山城址为秦和南越国“定揭道”治所^[51]。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52]，虚授南越国实际控制的岭南原秦三郡予吴氏长沙国。汉初，岭南地区还有虚封的海阳侯徭毋余^[53]和陆量侯须无^[54]（陆量侯即陆梁侯^[55]），封地在今广东连州市至广西灌阳一带；“汉时受封”^[56]的句町侯国则存续至西晋。又，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57]，学术界多认为南海国虚封在今闽、粤、赣交界地区；另有学者认为“汉初南海国地跨闽赣，以闽西南、赣中为疆域”，南海王实有其国，至“文帝时反汉被灭”^[58]。

其四，政治中心、经济文化中心发生较大范围的转移。

南越国灭亡后，番禺从都城下降为南海郡治，西汉交趾刺史治在苍梧郡治广信（今

梧州)，或驻交趾龙编（今越南北宁）；东汉交州刺史治在广信，东汉末年移治番禺（今广州）。有学者认为随着交州刺史治所在苍梧郡治广信的确立，“汉南海郡在岭南地区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彻底消失”，经济实力也一落千丈^[59]。东吴时期由于经济开发、北部湾近海交通线变更、岭南东部地区治理强化等原因^[60]，黄武五年（226年）分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最终形成交、广分治的行政格局。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行政设置及其治所的物质形态有其边远属性，如今广西境内湘桂铁路以西的区域尚未发现汉代城址，有学者推测桂西地区的大部分汉县“形同虚设，也就没有建筑作为县级住地的城池”^[61]。综合考察地理环境、族群分布等背景因素在行政设置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行政空间结构分为两类情形。

第一，秦汉王朝在岭南地区的实质性行政管辖地区，主要是汉代岭南七郡以郡县治所为中心的范围，其中又分为两大板块^[62]。岭南北部、东部，即自西江中下游河段及其主要支流（桂江、贺江）至珠江三角洲，包括北江流域和东江中下游地区，属于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东部和零陵郡一部，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汉文化大多已经连片分布，此为一个板块；岭南西部、南部，包括环北部湾沿岸的广西南部、越南北部及濒临中国南海西岸的越南中部地区，属于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社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土著越人的根脉更为深厚，汉文化主要依郡县治所和交通线路呈点、线分布，不过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的次生越人已经普遍发育，此为另一个板块。

第二，秦汉王朝在岭南地区的羁縻性行政管辖地区，主要包括桂西地区大部、粤东地区一部及海南岛，还包括夹在秦汉王朝实质性统治区域内部两大板块中间的粤西南一桂东南山地。这些地区基本为土著越人部族占据，南越国和秦汉王朝与其保持着羁縻关系，汉文化只是零散存在。以桂东南地区为例，南越国时期已经存在与秦汉属国、“凡县主蛮夷曰道”^[63]相类似的羁縻设置，东吴设置合浦北部都尉，西晋设置合浦属国^[64]，表明这一地区的族群结构和人文民俗比较特殊。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年）在合浦北部立越州，“越州多夷僚，瘴疠又重，有一定的特殊性，恐怕这才是越州建立的主要原因”^[65]。

汉代合浦郡的范围大体相当于旧称的广东南路地区（1959-1965年合浦隶属广东），这一地区处于汉代岭南地区两大社会文化板块的联结地带，东部、北部为南海、苍梧、郁林三郡，南部为交趾等三郡，考古学文化面貌表现出许多过渡性特征。秦汉时期的属国这类羁縻行政建置通常设置在边远地区，依靠当地王侯君长“因其故俗”^[66]进行管理，合浦地区行政设置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羁縻建置方面。此外，合浦郡的管辖范围还“凸显了汉代合浦郡在南海西部的海防及对外事务管理上的重要性”^[67]，而西汉合浦县的辖境“要比徐闻、高凉、临允、朱卢四个县各自的范围大”^[68]，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

-
- [1]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 [2] [西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0，第9页。
 - [3] 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 [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57页。
 - [5]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第35页。
 - [6] [南朝]范晔：《后汉书·马援传》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65，第838页。
 - [7] 考古学者使用的西江中游概念较宽泛，包括地理学意义上的郁江下游、浔江和西江下游，大致即贵港—梧州—三水河段。
 - [8] 广西民族博物馆课题组：《南流江出海口历史上海岸线变迁及汉代港口位置》（内部资料），2012，第4、34页。
 - [9]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第1670页。
 - [10] [南朝]范晔：《后汉书·孟尝传》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473页。
 - [11] [唐]房玄龄等：《晋书·陶璜传》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74，1561页。
 - [12] 柯佩琮：《对〈岭外代答〉一处失误的辨证》，《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4期。
 - [13] 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 [14] 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第12期。
 - [15] 潘雄：《骆越非我国南方诸族先民考》，《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
 - [16] [汉]杨孚：《异物志》，中华书局，1985，第3页。
 - [17] 陆明天：《秦汉前后岭南百越主要支系的分布及其族称》，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143-158页；张荣芳：《两汉时期苍梧郡文化述论》，载《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第179-206页。
 - [18] 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载《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一）》，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2，第1-79页；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64-182页。
 - [19] 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考古》1982年第2期；《夜郎句町比较研究》，载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 [20] 江应樑：《说“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 [21] 方铁：《百越在西南地区的分布新议》，《思想战线》1993年第6期。
 - [22] 郑君雷：《西瓯、苍梧与南越》，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63-272页。
 - [23] 郑君雷：《也说“瓯骆联盟”和“瓯骆国”》，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
 - [24]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 [25] 练铭志：《试论广东俚汉民族关系》，载中国民族史学会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18-140页。
 - [26] 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 [27] 张忠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载《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第125-147页。
 - [28]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29]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236页。
- [30]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3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地理志四》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75,第1738、1742页。
- [32] 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载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等编《百越研究(第一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 [33] 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百越民族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17-230页。
- [34] 蒋廷瑜:《“劳邑执刳”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 [35]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6页。
- [36] [南朝]范晔:《后汉书·孝安帝纪》卷五,中华书局,1965,第226页。
- [37] [南朝]范晔:《后汉书·孝灵帝纪》卷八,中华书局,1965,第340页。
- [38]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6页。
- [39]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4页。
- [40] 江应樑:《说“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 [41] 钱宗范:《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李龙章:《秦汉象郡辨析》,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446-456页。
- [42] [汉]班固:《汉书·昭帝纪》卷七,中华书局,1962,第231页。
- [43] 李珍:《汉代零陵县治考》,《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 [44]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45] 蒋廷瑜:《广西地区最早的县——洮阳》,《学术论坛》1981年第6期;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出土的楚文物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 [46] [南朝]范晔:《后汉书·卫飒传》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459页。
- [47] 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31-245页。
- [48]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七,蜀南桐花书屋薛氏家塾,1879,第3页。
- [49]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18页。
- [50] 蒋廷瑜:《“劳邑执刳”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 [5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华狮雄山》,科学出版社,2014,第182-183页。
- [52] [汉]班固:《汉书·高帝纪》卷一下,中华书局,1962,第53页。
- [53]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第909-910页。
- [54] [汉]班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卷十六,中华书局,1962,第594页。
- [55]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第948-949页。
- [56]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中华书局,1985,第60页。
- [57] [汉]班固:《汉书·高帝纪》卷一下,中华书局,1962,第77页。
- [58] 李庆新:《南海国考辨》,《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 [59] 刘瑞:《禁锢与脱困——汉南海郡诸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254-272页。
- [60] 段塔丽:《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 [61] 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载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43-50页。
- [62] 郑君雷:《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19-231页。

[63] [南朝]范曄:《后汉书·百官五》志第二十八,中华书局,1965,第3623页。

[64] 《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吴录》:“孙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为合浦北部,以都尉领之”;《宋书·州郡志四》:“宁浦太守,《晋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立。……《吴录》孙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为合浦北部尉”。又,明崇祯十年(1637年)刻本《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记“元封五年置交趾郡刺史,领七郡治。成帝绥和元年春三年,设合浦郡都尉”,西汉成帝置合浦都尉事未见正史文献记载。

[65]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2页。

[66] [汉]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59,第2934页。

[67] 邱立诚:《合浦——历史的选择》,载《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2008,第445-455页。

[68] 杨式挺:《略论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点》,载《岭南文物考古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7,第270-286页。